

# 金沙遗址蛙型金箔与蛙崇拜源流初探

屈小玲

(四川师范大学 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四川 成都 610072)

**摘要:** 古老的蛙崇拜以两种形式存在: 一是文物, 一是神话与民间信仰, 两者互为表里。古蜀王国金沙遗址蛙型金箔与马家窑彩陶蛙纹有着传承关系; 蛙型金箔象征了蛙崇拜祭祀仪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蛙崇拜南传与彝族先祖由蜀入滇相联系。古蜀王国在源于马家窑彩陶的蛙崇拜南传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关键词:** 马家窑彩陶蛙纹; 蛙崇拜; 古蜀王国; 蛙型金箔; 民族迁徙

**中图分类号:** K87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3X(2010)04-0070-06

蛙是人类文明史上崇拜的古老动物。马家窑彩陶蛙纹、成都平原金沙遗址蛙型金箔以及中国西南与南方民族地区的青铜鼓蛙饰, 串起了一条中华民族蛙崇拜观念的南传路线。本文拟对金沙遗址蛙型金箔与蛙崇拜源流予以考察, 籍以探讨古蜀王国及民族迁徙在蛙崇拜南传中的作用。

## 一、马家窑彩陶蛙纹及其蕴涵的巫术意义

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两枚蛙型金箔(2001年发掘)在众多出土的金器、玉器和青铜器中并不引人注目, 但却是最独特的考古遗物。在《金沙遗址出土金蛙之寓意探析》一文中, 作者认为金蛙系祭蛙求雨仪式后的遗存<sup>[1]</sup>。在古蜀王国时代用珍稀黄金制作祭祀物金蛙, 足见祭祀的尊隆。金沙蛙型金箔是否与中华民族最古老的蛙崇拜有关? 要回答这个问题, 需要追溯马家窑彩陶蛙崇拜的巫术意义。

距今约5300年到4050年的仰韶文化的马家窑彩陶绘有丰富的动物纹和几何纹, 动物纹饰尤以蛙纹著称。马家窑彩陶蛙纹揭示了中华民族早期蛙崇拜观念, 这是学术界探讨马家窑彩陶蛙纹的基本共识。马家窑彩陶按时间和地点分为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马厂类型。从考古出土的众多的马家窑彩陶序列来看, 早期的马家窑类型的蛙纹属于写实风格。彩陶瓶表面彩绘的蛙形象简朴, 有着两只大眼睛和膨大浑圆的肚腹, 身躯布满涡纹水点。到了后期马厂类型时期, 蛙纹从写实向抽象写意发展, 出现多种变体的蛙肢纹。这种蛙肢纹多用蛙的四肢和头部及眼睛

构成几何图形, 较典型的是由一竖直和两条上下分别弯曲的横向几何线条组成, 既像蛙又似人。在有关研究中被认为是“交媾的姿势”, 代表了一种“巫术的符号”。这种符号性的蛙肢纹型成为马家窑彩陶马厂类型的一种标准模式, 它“与整个马家窑文化彩陶中的生殖与求雨的文化母题相一致”<sup>[2]</sup>。马家窑彩陶蛙纹具有古人生殖崇拜和祈雨的巫术意义, 因此马家窑彩陶的蛙纹从具象的写实演变为抽象的写意, 并非只有单纯的装饰作用, 而是蕴含了蛙崇拜观念。

马家窑蛙彩陶蛙纹与女娲的联系, 揭示了蛙崇拜观念所具有的实用性。在中华民族的神话传说中, 女娲与人类繁衍和祈雨有密切关系。文献记载女娲造人的神话, 见于汉代邵应的《风俗通》中的女娲“抟黄土作人”。汉代的民间发展出了女娲兄妹结成夫妇创造人类的传说, 在汉代各地的画像石上, 出现了女娲和伏羲夫妇人首蛇身的交尾图像。但据今人考证, 有关女娲兄妹的传说最早的记录是在敦煌发现的六朝写本, 详细的故事见于敦煌写本伯4016《天地开辟以来帝王纪》<sup>[3]</sup>。女娲神话传说和蛙崇拜在传播中被联系在一起, 因为蛙也是易于繁殖的动物, 在生殖意义上与女娲“抟黄土作人”有相似性。《说文解字》解释女娲的音义时将其与蛙联系在一起: “媧, 古之神圣女也, 化万物者也, 从女帛声, 古蛙切”。今之人类学学者有论及女娲即是蛙图腾神, 认为“媧”与“蛙”同<sup>[4]</sup>。“媧”即“蛙”, “女”与“雌”同, “女娲”即“雌蛙”<sup>[5]</sup>。说明蛙崇拜即是女娲崇拜, 女娲崇拜即是蛙

收稿日期: 2009-11-03

作者简介: 屈小玲(1955-), 女, 四川省开江县人, 四川师范大学教授, 主要研究人类学、巴蜀文化及艺术史。

E-mail: alainxiao@gmail.com

崇拜,女媧是蛙崇拜的具体形象体现。据实地考察黄河流域今之造型各异的彩陶蛙纹的记叙,在当地人的蛙崇拜观念里,女媧与蛙纹之间确实存在联系<sup>[6]</sup>。民间传说中女媧与降雨有联系,文献中即有类似民俗记载:“雨不霁,祭女媧”<sup>[7]</sup>。蛙是和雨水有密切关系的动物,民间就有“蛙声哑,禾苗枯”;“青蛙呱呱叫,大雨就要到”的民谚,这也是蛙与女媧之间的又一共同之处。在古人的信仰中,生殖和雨水之间存在某种神秘联系,阴阳和谐,才会降雨,因此求雨则与性有关联。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曾反复论述了地方政府在四季求雨时的必备仪式,其中就有男女相偕:“令吏民夫妇皆偶处”,直到“起雨为止”<sup>[8]</sup>。

从以上考察可以看出,仰韶文化马家窑彩陶蛙纹遗存与女媧的神话传说都属于原始崇拜。马家窑彩陶早先的蛙纹只是一种装饰,蛙的繁殖能力及其对干旱雨水的生理反应,逐渐形成了蛙崇拜观念,蛙纹也从写实发展为具有交媾意义的抽象蛙肢。将蛙崇拜与女媧联系在一起,与女媧造人及女媧补天的神话传说有关。在马家窑彩陶蛙纹的巫术意义和女媧神话传说中都反映了生殖和雨水之间的联系。女媧与蛙崇拜相联系,符合早期先民的思维方式,也揭示了先民信仰的原始性和神秘性。

## 二、金沙遗址蛙型金箔与马家窑彩陶蛙纹的传承关系

从形状上比较,金沙遗址的两枚蛙型金箔与马家窑彩陶蛙纹很相似<sup>[9][30]</sup>。作为考古文物,马家窑彩陶蛙纹存在于中国西北,金沙遗址蛙型金箔出现在中国西南。两种文物遗存的时间相距甚远,制作材料也不相同,但金沙遗址蛙型金箔与马家窑彩陶蛙纹有明显的传承关系。从工艺技术来看,金沙遗址蛙型金箔受到商周时期华夏文明金饰品影响,同时也展示了古蜀王国蛙崇拜信仰。

金沙遗址的两枚蛙型金箔基本相似。一件长6.9厘米,宽6.2厘米,厚0.1厘米,重4克。另一件长7厘米,宽6厘米,厚0.16厘米,重3克<sup>[9][31]</sup>。蛙型金箔的蛙缩头,两只圆眼并列,身型类亚字,四肢两两相对弯曲向内卷。笔者发现,将这两件金沙遗址的蛙型金箔与马家窑彩陶上的典型的蛙纹比较,不难看出它们的形状类似马家窑彩陶后期马厂类型的蛙肢纹基本模式,尤其与前面举证的“仅只表现一对下肢的交媾图”彩陶盆蛙肢纹非常相似。金沙遗址的蛙型金箔也是上下四肢两两相对,中间是躯干,整个图形以蛙肢组成。作为独立的金制工艺品,金沙遗址蛙型金箔的蛙肢纹造型更弯曲圆浑,整体图案呈对称形式。

从巫术的意义来说,对称动物图案,多与动物交尾,交配的变形有关<sup>[10]</sup>。如同前面论及的马家窑彩陶的蛙纹饰具有生殖崇拜和求雨巫术仪式的内涵,金沙遗址蛙型金箔的制造,不但给我们留下了古蜀王国时期古蜀人的蛙崇拜习俗,也给我们留下一个实物证据,即古蜀人的蛙崇拜与仰韶文化的马家窑彩陶文化有着传承关系。金沙文明遗址是古蜀王国后期文明,即开明王朝时期。开明王朝从春秋前期到秦灭蜀国,历十二代,约为公元前660年前后至316年<sup>[11]</sup>。古蜀王国神灵祭祀仪式非常发达,在其前期文明遗址三星堆发掘的青铜像、青铜神坛和青铜神树就是最好的遗物证明。以马家窑彩陶蛙肢纹所蕴含的生育繁殖和求雨的巫术意义为证,金沙遗址蛙型金箔的蛙肢纹形状必然也会令人与蛙崇拜祭祀仪式联系起来。两者之间为什么会存在传承关系?古蜀王国为什么如此重视蛙崇拜,而以黄金制造的蛙型金箔作为祭祀物?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考察马家窑彩陶文化有否在西南地区传播以及古蜀王国的社会历史。

古蜀人与从北往南的民族迁徙关系密切。古蜀王国地域系今之成都大平原,包括成都及周边区县。古蜀王国的形成,系族群融合的结果。费孝通先生在提出研究中国各地区的民族分布与走向时,提到在古代从北往南的民族迁徙中,中国西南有一条民族迁徙走廊<sup>[12]</sup>。这个观点经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的考察研究得到证实,中国西南确实存在一条西北民族往西南迁徙的通道。在川、藏、滇三省区边境内的横断山脉中,从北往南有著名的六江流域,包括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六江流域上中游居住的众多民族都属于藏缅语族,有藏、羌、彝、白、纳西、普米、独龙、怒族、阿昌、景颇、拉祜等民族,包括了西南的大多数少数民族。从族源而论,藏缅语系的民族都可以追踪到岷江上游的羌族。有关研究指出:“现今的羌族是古代羌人的一支后裔,而古羌人的众多支系已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衍变为现在的藏缅语族的各族。”<sup>[12]</sup>并认为中国西南藏缅语族中的藏族、彝族等民族的根源即是古代甘青之交的黄河上游及渭水上游一带的羌人<sup>[13]</sup>。古蜀国与西北南下羌氏民族有族源关系。据文献记载,古蜀先民属西北氏族。三代蜀王蚕丛、柏、鱼凫中最早的蚕丛氏“始居岷山石室中”(《文苑》章樵注引《先蜀记》),蚕丛氏是氏族分支冉马(《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鱼凫氏也是氏族一支,最后形成蜀族,逐步建立早期蜀国<sup>[14]257-260</sup>。氏族与羌族原本同源,蜀国先

民与氏羌民族都有联系<sup>[15]</sup>。

西北羌氏文化随着民族迁徙,也往西南传播。据四川考古发现,在六江流域尤其是岷江上游,四川考古在岷江上游地区发现的石棺葬,与20世纪80年代在青海民和县发掘的石棺葬属于同一类型,是以古羌人为主体的西戎部落的遗存,包括羌氏民族<sup>[12]</sup>。青海民和县即是发现马家窑彩陶马厂类型遗址的地方,这正是马家窑彩陶蛙饰从写实变为抽象,发生出蛙崇拜观念的源头。在现今羌人居住的岷江及其支流汶川和理县一带发掘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陶器,其中有夹沙陶、泥质红陶等成分,被认为“其纹制与制作方法与甘青马家窑文化极为相似,显系受西北古文化影响所致。”<sup>[12]</sup>在《黄河上游彩陶南传之路探索》一文里,论者根据考古遗存的分析,更明确了马家窑彩陶经岷江南下的路线:“在岷江上游的理县、茂县营盘山和姜维城遗址发现了典型的马家窑文化彩陶”,“有可能彩陶的影响是由川西山地向南进入横断山区”<sup>[16]</sup>。也有研究从彝族的民族艺术品的纹样考察西南彝族艺术与西北马家窑文化的同源关系:“彝族服装服饰与生活用具上繁多的纹样,与西北马家窑出土文物上的符号有着许多相通之处,也证实彝族远古来自西北,他们也许正是马家窑文化的创造者”<sup>[17]</sup>。在前面提到的考察马家窑彩陶南传路径的论文里,作者也提出过在成都平原地区至今尚未发现有马家窑文化彩陶遗存<sup>[16]</sup>。那么,古蜀王国金沙遗址的蛙型金箔,是否正好弥补了考古发掘这一空白?虽然目前看来还是孤证,但是它的典型的蛙肢纹造型,无可辩驳地显示了其直接源于马家窑文化后期彩陶马厂类型的蛙肢纹模式的实事。

金沙遗址系古蜀国开明王朝时期的重要遗址,开明王朝是继蜀国杜宇王朝洪水之后的新王朝。杜宇王朝时期大力发展农业,种植五谷,青铜器和玉器金饰品手工艺都非常发达,有名的三星堆遗址的青铜器和金沙遗址的玉器金饰品都是杜宇王朝的文物遗存。后来因长江上游支流沱江水患,杜宇王朝禅让开明王朝<sup>[11]</sup>。蛙对干旱的敏感和预卜,古蜀民俗中蛙崇拜习俗,在以农业耕作文明立国而强盛的杜宇王朝自然会流行。继后的开明王朝治理成都平原水患获得成功,农业耕作得到更进一步保障,国力愈加强大。古蜀国民俗中的蛙崇拜巫术意义更加受到重视,蛙型金箔的出现就是最好的说明,蛙崇拜上升成了国家祭祀仪式。

综上所述,从西北南下民族迁徙走廊、新石器时期的葬式考古发现、马家窑文化彩陶南传遗迹、彝族

服饰的符号性纹样、古蜀先民的羌氏族源以及古蜀王国蛙型金箔祭祀意义,基本提供了西北羌氏族和马家窑文化沿岷江上游支流南下的证据。源于马家窑彩陶蛙纹的蛙崇拜从西北传到古蜀王国,供祭蛙仪式用途的蛙型金箔因而出现在成都平原。它的出现,显示了古蜀王国对蛙崇拜观念的重视。

从彩陶蛙饰到铸造蛙型金箔,在手工技艺上也是人类物质文明的一大进步。在约等于商代晚期及周代初期的四川广汉古蜀王国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1986年)及金沙遗址考古发掘(2001)的众多遗物中,集中出土了为数不少的黄金制品。联系商周时期中原金制品制作技术,古蜀王国也属于北方中原商周流行的金箔饰品文化,金沙遗址的蛙型金箔就是这一黄金制品技术的产物。商代出现的黄金制品,大多是作为装饰的金箔、金叶和金片,其技术制作系黄金融化后反复捶打而成:“凡造金箔,既成薄片后,包入乌金纸内,竭力挥椎打成。”<sup>[18]</sup>北方墓葬出土较多商周时期的金箔饰品,大多为兽类金饰<sup>[19]</sup>。在古蜀王国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出土的以金箔包裹装饰的遗物则大多与王权和祭祀有关,以金箔权杖、金面罩、金冠带、金箔太阳神鸟以及金箔鱼形蛙型和金饰品为主,显然与北方的兽类金饰相异。

金沙遗址的蛙型金箔已经超出了金箔的装饰意义。它与一般用于装饰某种物品的金箔不一样,而是一件具有独立意义的金箔制品,它的蛙肢纹造型本身就具有了蛙崇拜的原始信仰和巫术意义。蛙型金箔的技术和艺术在商周之际也达到了金制品的完美高度:蛙型金箔造型简练,沿着肢体饰有分别引向四肢的乳钉纹图案,采用的是篆刻工艺。蛙型金箔的造型与装饰都以对称为重点,同时融合了弯曲的弧形,单纯中有变化,完全符合形式美的最高原则。金沙遗址的两件蛙型金箔,既反映了古蜀文明与马家窑彩陶文化蛙崇拜的文化母题意义的一致性,也展示了古蜀王国的高超的黄金制品手工艺制作技艺和成熟的审美趣味。

从马家窑彩陶蛙纹到金沙遗址蛙型金箔,历时久远。马厂类型蛙肢纹流行时期大约在4000多年以前,金沙遗址开明王朝距今约为2700年左右,中间相距约为1600年,足见蛙崇拜这一观念的久远牢固。

### 三、彝族先祖由蜀入滇与蛙崇拜传播

上面考察了金沙遗址的蛙型金箔与马家窑彩陶后期马厂类型的蛙肢纹模式的传承关系,蛙崇拜习俗在古蜀王国成为国家动物神灵祭祀的仪式之一。

下面将考察蛙崇拜南传与西周末年彝族先祖由蜀入滇的关系。

在中国西南和南方民族地区,广泛流行蛙崇拜观念。见于西南地区藏彝走廊的藏缅语诸民族,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佤族,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布依族、壮族和侗族,以及汉藏语系苗瑶支系的苗族与瑶族。这正是蛙崇拜南传的广大区域,包括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海南,以及越南北部、缅甸、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在蛙崇拜流行的中国西南和南方民族中,蛙变成了雄性,有蛙创世的神话以及蛙神蛙祖传说,这也表明中国西南和南方的蛙崇拜出现在男性氏族社会<sup>[20]</sup>。壮族、佤族等民族的民俗中至今还流行着与蛙崇拜相关联的民间传统节日。与此同时,在中国西南、南方两广境内以及海南等民族地区流行的古代乐器遗物、铜鼓鼓面流行的蛙饰,是蛙崇拜南传的重要标志。通过铜鼓蛙饰考察蛙崇拜南传的线路,涉及铜鼓起源与民族迁徙。

一个多世纪以来,对中国南方的青铜鼓和东南亚青铜鼓的起源有不同说法,先后大致有天竺说(马端临)、北越说(越南陶维美)、中国南部说(荷兰狄葛乐)、中国西南濮僚说(童恩正等)。国内铜鼓按时代先后分为8个类型: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冷水冲型、遵义型、麻江型、北流型、灵山型和西盟型,分别分布在西南和南方民族地区。最原始的铜鼓是滇西楚雄万家坝型铜鼓(公元前8世纪-前5世纪),简陋无装饰<sup>[21]</sup>。稍后是云南滇池青铜文化区域的晋宁县石寨山型铜鼓(前5世纪-前1世纪)。童恩正在《试论早期铜鼓》中提出了铜鼓产生与江河地带农业文明的关系:“大约在公元前七世纪或更早一点的时候,居住在滇东高原西部的一支属于濮僚系统的农业民族,最早使用了铜鼓这种乐器。当时在驮娘江-右江-郁江水系以及礼社江-元江-红河水系具有适于农耕的红色土壤的河谷地带,都有这一系统的民族居住,所以它就迅速地在这类区域流传开来<sup>[22]</sup>”。有关云南先民的族属有不同说法,本文取濮越说,濮僚系殷商及先秦时期的濮越人,属于古越族。濮僚族发明的铜鼓因此沿着适宜农耕上文江河流域的河谷地带传播,包括东西从北往南的两大水系。楚雄万家坝型铜鼓产地在今之楚雄彝族自治州境内,是彝族在云南的重要聚居地之一。早期万家坝型铜鼓系濮僚人所创还是彝族人所创?参考彝族民族史诗《西南彝志》和英雄史诗《铜鼓王》所提供的资料,似可商榷。

西南和南方铜鼓出现似与西周末年彝族先民由蜀入滇民族迁徙有关。根据清初编撰的彝族历史文

献《西南彝志》(1957-1966译成汉文)编选的《西南彝志选》第二章《谱牒志》,详细记述了彝族从希慕遮到笃慕的三十一世和笃慕之后“六祖”以下的各主要家支世系及历史事件,这正是一部讲述彝族先祖向西南和南方迁徙繁衍的历史。从希慕遮到笃慕之世,“其下限相当于西周末年蜀洪水时期,笃慕是在洪水发生后由蜀入滇的,落点在云南东川(会泽)乐尼白。笃慕妻三房,子六人,由此分居各地,向四方发展”。历史上的“西周末年蜀洪水”系指公元前7世纪古蜀王国杜宇王朝时期长江上游沱江水患,造成了成都平原北部三星堆一带江河流布,金堂峡河流壅塞,田野长久淹没,导致了杜宇王朝禅让的水患。笃慕因之迁徙入滇,娶妻生子。其子分别向滇西、滇中、滇南、川西、川南、滇东、黔省和广西隆林等地迁徙发展,此即彝族“六祖”,并分别繁衍成不同支系<sup>[23]</sup>。

彝族英雄史诗《铜鼓王》则详细记叙了彝族的一支昆明人罗罗发明铜鼓以及伴随民族迁徙铜鼓也随之传播的史实。《铜鼓王》系祭司毕摩在祭祀仪式上演唱的世传歌词,又叫《铜鼓歌》,历史悠久,流传在云南富宁县、广西那坡县和越南与中国交界罗罗支系彝族的居住区。《铜鼓王》共20章,每章标题皆与“鼓”联系,叙述铜鼓从产生到传播及其铜鼓文化习俗。据《铜鼓王》所叙,昆明人系从昆仑山南移岷江雪山下的彝族支系,早期系游牧族,入滇称昆明人。昆明人先祖发明了铜器,其后裔波罗在改造土锅的梦中受到启发铸造成功铜鼓,被部落民尊为铜鼓王。这说明昆明人发明铜鼓与铜鼓考古发掘万家坝型起源相同,系由炊具铜釜演变而来。《铜鼓王》揭示出铜鼓传播与昆明人从东迁滇池、滇南、滇桂、滇越与滇缅方向的5次迁徙有关,并与西南和南方不同民族铜鼓文化产生有直接联系。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推断铜鼓发明与由蜀入滇的彝族人关系密切。早期铜鼓楚雄万家坝型,正是今之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系云南彝族人的重要聚居地区之一。在云南境内滇青铜文化早期铜鼓产生的地区,也大多是今之彝人生活的地方。考古发现的8种铜鼓类型产生地点也与《西南彝志》中所叙彝族历史上往川西川南、滇、黔、桂的迁徙地带相符。彝族先祖由蜀入滇,落点是滇东会泽(东川),即铜鼓起源为濮僚人系统发明之说的滇东高原。最早的楚雄万家坝型铜鼓也在滇青铜文化区域,滇青铜文化区域东止于云南东川。《铜鼓王》叙述发明铜鼓的昆明人在滇中以西。据《西南彝志选》的《前言》扼要介绍彝族先主笃慕入滇妻三房生六子的迁徙去向,其“长房

生子慕雅切、慕雅考,向‘楚吐以南’发展为武、两个支系,分布于滇西、滇中、滇南一带,是当地彝族及其它彝语支的一些民族之祖<sup>[23]</sup>。如是,铜鼓起源于滇中以西就与彝族六祖长房有关。英雄史诗《铜鼓王》中记叙的铜鼓的发明者昆明人以及该支系往滇中、滇南及与其相邻的滇桂、滇越、滇缅的迁徙,即与彝族六祖长房向外迁居中发展出来的支系遍布滇西、滇中、滇南的史实基本相符。《铜鼓王》叙述彝族昆明人迁徙年代晚于由蜀入滇的彝族先民,大约始于比云南六昭时代较早的年代。但关于铜鼓的发明和伴随民族迁徙的铜鼓传播,却与考古发现的铜鼓分布和分类基本吻合,值得引起有关研究的充分注意。

铜鼓蛙饰与蛙崇拜往西南和南方传播,同样与彝族人由蜀入滇的民族迁徙有关。西南和南方民族大都有蛙崇拜观念,不排除或与本民族信仰有关联。但铜鼓蛙饰的产生,仍然与彝族人的蛙崇拜观念有联系。

考察比较典型的铜鼓蛙饰出现的地区,皆源出滇池晋宁石家寨型铜鼓,因此与万家坝型有直接联系。中国著名的铜鼓蛙饰在以下几个民族地区:一是广西境内壮族地区的铜鼓。广西壮族出土的古代铜鼓上多见蛙饰,大小蛙累叠,以群蛙的形式出现,显示了壮族祖先骆越族的蛙崇拜观念。二是海南黎族铜鼓著名的蛙锣。蛙锣装饰更显示出巫术意义:蛙与八卦符号和圆环相互交错,蛙崇拜具有了更为丰富的涵义。稍晚的是云南西南部佤族地区流行名之为‘西盟型’铜鼓。鼓面塑立体青蛙,由大蛙、中蛙、小蛙三四层叠居,被称之为‘蛙鼓’。佤族传说中尊青蛙为民族祖先,铜鼓蛙饰反映了佤族对青蛙的图腾崇拜。略为考察一下西南和南方铜鼓蛙饰的分布与类型,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承传关系。考古发现的最早的蛙饰是滇池石家寨山型铜鼓(公元前5世纪-1世纪)的一例,有了蹲蛙雕饰。广西境内冷水型铜鼓(公元1世纪-12世纪)有蛙饰,冷水型铜鼓与滇池晋宁石家寨山型铜鼓有继承关系。广西北流型(公元1世纪-12世纪)的蛙饰又与冷水型铜鼓蛙饰有联系。海南黎族铜鼓制造与铜鼓蛙饰乃经由广西、广东传播而来。云南西南部佤族的铜鼓蛙饰出现较晚(公元8-20世纪),与《铜鼓王》中彝族昆明人迁徙到中缅边境定居时间符合,其蛙饰与广西境内铜鼓和石家寨山型铜鼓也有传承关系。以上考察说明,西南和南方的铜鼓蛙饰都可以追踪到滇中石家寨山型的铜鼓蛙饰。联系彝族英雄史诗《铜鼓王》中滇池人铸造铜鼓

系彝族昆明人传授,铜鼓蛙饰所显示的蛙崇拜观念与由蜀入滇的彝族有了联系。

彝族先民发明铜鼓、铜鼓蛙饰以及传播蛙崇拜观念,与古蜀王国青铜器影响和重视蛙崇拜有关。西周末年彝族先祖离蜀入滇的时代,古蜀王国已经历了杜宇王朝发达的稻作农业与辉煌的青铜工艺制造。四川考古学界认为,成都平原古蜀青铜文化“较早渗入和影响了滇文化”<sup>[14][32]</sup>。在滇池地区晋宁石家寨山滇王及其贵族墓地、江川李家山滇王及贵族墓地等,均出土大量精美的青铜器,被认为找到了三星堆用青铜塑造人像的传统:“滇人用青铜器塑造自己的形象与三星堆如出一辙”,青铜器中就有“有蛙纹的铜鼓。”<sup>[24]</sup>万家坝型铜鼓属于民间早期制作,还没有发展出装饰的审美意义,但继承万家坝型铜鼓的石家寨山型铜鼓发展出了铜鼓蛙饰,自然与发明铜鼓的彝族人的蛙崇拜观念的影响分不开。彝族先民是经西北岷江上游迁徙南下与当地融合的,古蜀王国民俗中有蛙崇拜传统。古蜀王国农业稻作文明发达,正是蛙崇拜观念走向成熟的最适宜的土壤。彝族先民迁徙入滇,并向川、黔、滇桂、滇越以及滇缅四方发展,不可能不会带去古蜀王国的文化习俗。在彝族的创世神话《勒俄特依》中叙述雪子12支繁衍,蛙属于动物中创世的一种。在随后的民族交往与稻作文明发达的影响下,西南和南方的其他民族都先后受到了古蜀王国彝族蛙崇拜的影响,因而随着工艺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在铜鼓上铸造蛙饰。将蛙崇拜的巫术意义投射到铜鼓上,实则与古蜀王国将蛙崇拜的巫术意义铸造成蛙型金箔属于同一种意义。

#### 四、余论

综上所述,蛙崇拜在其南传路线中,民族迁徙、手工艺制造技术都是重要的关键因素。古蜀王国在蛙崇拜南传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彝族先民由蜀入滇、发明铜鼓及铜鼓蛙饰并向四方发展,起到了蛙崇拜传播作用。

为什么人类选中了蛙来赋予其巫术意义,而且蛙崇拜能被不同地区的族群接受?笔者参考有关蛙的生物常识,认为既有生物学的原因,也与农业稻作文明发达有关。

作为自然界的生物,蛙与人类关系密切。一是生理特征的相似。蛙的骨骼与人类骨骼类同,它的四肢、肩胛骨和锁骨,形状非常像人的相应骨骼。其消化、神经系统也与人类相似<sup>[25]</sup>。在广西展出的春秋时代骆越族青铜尊上的写实蛙饰,立体,腹部朝前,

很像四肢伸张的婴儿。二是蛙的繁殖快,正好符合古人对民族繁衍的期望。广西铜鼓、海南黎族的蛙锣和云南佤族的蛙鼓都有累蛙叠错,实际上是雌蛙伏于雄蛙背上的背部孵卵方式。鼓面上雕饰大蛙小蛙相聚,都与蛙的受精产卵和繁殖相联系,足见人类对蛙的繁殖方式有认同感。

蛙崇拜南传,与农业稻作文明发展相联系。蛙崇拜在古蜀王国的扎根,与成都平原稻作农业发达相联系。铜鼓在中国西南、南方与东南亚出现的地区,都是稻作农业发达区域,同时也是蛙崇拜南传路径。如对彝族地区铜鼓纹饰的有关研究中就认为:“铜鼓面上的太阳、云、雷、蛙、竞渡、游戏等纹饰,均与稻作生产中的祈雨和祈水关联”<sup>[26]</sup>。蛙如同晴雨表,对干旱和下雨都有生理条件反射,干旱和下雨在稻作农业地区维系人类的生存,所以在蛙崇拜产生的西北高原将蛙与女娲联系在一起,而在蛙崇拜南传地区民间流行蛙是创世神,人类始祖以及蛙神的神话和传说,证明蛙在农业文明地区与人类关系的密切。

#### 参考文献:

- [1] 黄剑华.金沙遗址出土金蛙之寓意探析[J].东南文化,2004(1).
- [2] 孙新周.中国原始艺术符号的文化破译[M].北京:中央民族出版社,1999:35,74-75,36.
- [3] 刘锡诚.陆沉传说再探[J].民间文学论坛,1997(1).
- [4] 杨.女娲考[J].民间文学论坛,1986(6).
- [5] 何星亮.图腾与神的起源[J].民族研究,1989(4).
- [6] 刘黎明.宋代民间巫术研究[J].成都:巴蜀书社,2004.
- [7] 王充.论衡·顺鼓篇:卷十五[M].明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吴郡苏献可刻印“通津草堂”本.
- [8] 董仲舒.春秋繁露第七十四:求雨[M].清代卢文弨抱经堂校刊本.
- [9]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21世纪中国考古新发现——金沙[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
- [10] 宋兆麟.生育神与性巫术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158.
- [11] 刘少匆.雾中王国[M].成都:巴蜀书社,2004:72.
- [12] 李绍明.西南丝绸之路与民族走廊[G]//段渝.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成都:巴蜀书社,2008.
- [13] 关振兴.远古时期兰州的羌文化[EB/OL].Http://Www.QiangZu.Com.
- [14] 段渝.酋邦与国家起源:长江流域文明起源比较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7:257-260.

古代文明的动物崇拜产生于比附。蛙在自然界,因为与人体的类似及其生育繁殖,成了受人喜爱的动物。古代自然界的生物与人类的关系是同伴关系,因此在母系社会时代的马家窑彩陶蛙肢纹,被用来比附生殖崇拜以及表现雨水与人类生活的重要联系,使其具有了巫术崇拜意义。金沙蛙型金箔更是古蜀王国蛙崇拜的祭祀物,显示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随着民族迁徙和稻作文明在中国西南和南方的发展,蛙崇拜在南传中通过铜鼓写实的蛙饰,不但保留了蛙崇拜的巫术意义,而且回到了民间艺术的源头,也融入了民族地区民众的日常生活与社会生活之中,使古老的蛙崇拜保留了鲜活的生命。同时,从中国西北到西南和南方的蛙崇拜遗物与蛙崇拜观念互为表里的传播方式来看,中华民族的蛙崇拜展示了它的独特性和丰富性。

本文系一孔之见,但在蛙崇拜南传路线的考察中,将蛙崇拜遗物与沿线民族的历史文献相结合,或许可以找到具有说服力的证据。

- [15] 李诚.巴蜀神话传说刍论——龙凤文化研究之二[M].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49.
- [16] 王仁湘.黄河上游彩陶南传之路探索[N].四川日报,2004-04-26.
- [17] 杨春甫.彝族蛙崇拜与生殖文化初探[J].民族艺术研究,1997(6).
- [18] 宋应星.天工开物:卷14[M].成都:巴蜀书社,1989:349.
- [19] 陈振中.先秦金器生产制作工艺的初步形成[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1).
- [20] 马学良,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35.
- [21] 杨路塔.中外铜鼓研究及布依族铜鼓文化考略[EB/OL].<http://www.chiyou.name>.
- [22] 董恩正.试论早期铜鼓[J].考古学报,1983(3).
- [23] 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西南彝志选:前言[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
- [24] 肖明华.南丝路上的云南青铜文化[G]//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2008:361.
- [25] COLIN D. Le dictionnaire des symboles, des mythes et des legendes[M].Paris:Marabout,2000:207-209.
- [26] 杨甫旺.彝族铜鼓礼俗与稻作文化[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1(4).

(责任编辑 李吉和)